

防御性的中国战略文化

冯惠云

越来越多的人在讨论中国崛起的世界影响。在这些讨论中,有两种理论视角值得我们关注,即结构现实主义和文化现实主义。信奉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学者认为,中国会如以往的大国一样,通过领土扩张达到国家崛起的目的。中国将在未来挑战美国霸权,以武力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最终试图通过战争改变国际体系现状。因此,即使目前中国的国力还不够强大,但崛起的中国仍是未来国际体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必须现在就加以遏制。信奉文化现实主义理论的学者则强调中国战略文化对中国外交决策和国家战略的影响。他们指出,中国有人文儒家和极端现实主义两种战略文化,但前者在中国战略决策中不起决定作用,极端现实主义文化(Realpolitik-Parabellum Realism)才是中国战略文化的主要特征。在极端现实主义文化的驱动下,崛起的中国将会成为未来战争爆发的焦点。虽然两种理论分析中国崛起影响的角度不同,但却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中国崛起将挑起战争,现在就必须开始遏制中国。

在批评以上两种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利用政治心理学中的行为代码量化分析方法提出了“中国战略文化防御论”的观点。所谓行为代码分析,是以决策人的公开讲话为研究对象,通过计算机对文本中动词进行量化分析与对比,科

《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4期(总第4期),第1—23页。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学地分析、预测决策人的战略文化取向。通过分析中国领导人在战争与和平状态下的信念体系变化,本文认为,中国的战略文化为防御性,中国领导人的外交决策倾向于维持和平,而非挑动战争。

全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结构现实主义和文化现实主义理论有关中国崛起的主要观点,剖析两种理论的缺陷和不足。第二部分主要分析战略文化理论在国家战略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并提出论文的主要假设——中国战略文化防御论。第三部分介绍政治心理学中的行为代码研究方法。第四和第五部分分别对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和平和战争环境中的行为代码进行量化分析,以检测本文的研究假设。第六部分是结论部分。

一、两种现实主义理论的主要缺陷

作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旗帜,现实主义理论有很多分支。本文主要分析为西方“中国威胁论”提供理论依据的两种现实主义理论:结构现实主义和文化现实主义。

结构现实主义强调国际体系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沃尔兹(Kenneth Waltz)的新现实主义理论、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和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霸权更替理论。^①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体系内的每个国家都要依靠自助的方式保障安全。要生存,就要保存实力,因为实力的大小是国家间的主要区别。实力强大的国家通过扩张实现地区霸权,来确保其安全和利益;弱小国家则可选择结盟制衡大国的威胁,否则小国只能依从大国利益,委曲求全。国家间的矛盾冲突主要来自“安全困境”和错误认知。安全困境是指国家间为争取安全而面临的一种两难情况。一方面,一国为实现安全而增加实力;但在其他国家的眼里,这是对其国家安全的挑战。因此,其他国家会增加安全投入,以保持平衡。另一方面,由于其他国家军事实力的增强,该国安全将面临着比以往更为严重的军事威胁。此外,安全困境所导致国家间的错误认知,往往成为国家间冲突的

^①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1979);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导火索。新现实主义还认为,生存安全是每个国家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中所能追求的最高目标,所以大部分国家希望保持现状。

新现实主义认为,崛起的中国现在正处在安全困境之中。由于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中国的崛起必然引起其他国家的警惕和担忧。因此,其他国家将试图通过联盟或增加各自军事实力的方式来平衡中国实力的增长。但中国则会把这些国家追求实力平衡的行为视为对其安全的挑战,从而被迫采取激进措施,借助武力争取生存安全。无论是台湾问题还是中美关系,都有可能成为中国卷入战争的导火索^①,因此,中国的崛起将威胁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安全。

20世纪90年代末,新现实主义理论派生出了新的分支,即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②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生存安全仍是国家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但实现安全的唯一手段是最大限度地增强军事实力。在国际无政府体系下,只有最具实力的霸主才能够保障绝对安全。因此,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最好的防御战略是采取主动进攻。即使本质上是维持现状的国家也会尽力增强军事实力,从而在行为上表现为改变现状的国家。

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崛起的中国是一个为追求生存安全而试图改变现状的国家。首先,随着国力的增长,中国将不惜使用武力来谋求相应的国际地位,以争取最大的安全。其次,军事实力的增加将激起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历史上被西方列强进攻的耻辱将导致中国领导人在很多国际争端中不得不采取强硬立场,以保证获得国内的民众支持和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再次,中国国力强大后,必然寻求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台独”与领土争端问题。最后,崛起的中国会试图改变国际规则,以谋求地区霸权,从而与美国发生冲突。^③

^① Alastair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2003, pp. 5—56.

^②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③ *Ibid.*, p. 4. 米尔斯海默对权力的定义突出强调军事力量而忽略了其他因素。另外可参考 Thomas Christensen, "Chinese Realpolitik: Reading Beijing's World-View," *Foreign Affairs*, Vol. 75, 1996, pp. 37—52; Christensen, "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 China's Rise and Challenges for U. S.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4, 2001, pp. 5—40; Gerald Segal, "Does China Matte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5, 1999; Paul Dibb et al., "Asia's Insecurity," *Survival*, Vol. 41, No. 3, 1999, pp. 5—20; David Shambaugh, "Sino-American Strategic Relations: From Partners to Competitors," *Survival*, Vol. 42, No. 1, 2000, pp. 97—115; David Shambaugh, "China's Military Views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3, 1999/2000, pp. 52—79.

霸权更替现实主义从动态角度分析了国家实力变化对国际关系体系的影响。这一理论指出,现有体系中的霸主是维持现状的国家,实力上升的崛起国则是现状的挑战者。随着实力的增长,崛起国必然希望改变现状,而以武力挑战既有霸主则是其树立威信必经之路。因此,当崛起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达到一定水平时,它将不惜一切发动对霸主的战争,为其建立新的国际体系扫清道路。对于现存霸权国来说,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安全,有可能先发制人,通过战争方式遏制崛起中的国家。霸权更替现实主义认为,当前国际体系中,美国是霸主而中国为崛起的挑战者。因此,中美之间必有一战。

以上三种结构现实主义理论都把中国归类为改变现状的国家或挑战者,认为崛起的中国是国际安全和稳定的重大威胁。然而,这些理论都没有从根本上探讨两个问题:(1)为什么改变现状的国家会存在?(2)如何确定哪些国家是改变现状的国家?这三种结构现实主义理论都“假定”崛起的中国会有改变现状的战略意图,并一定会通过武力实现战略目标。事实上,这一假定是以另一假定为基础的,即假定所有国家的利益都一致。然而,不同国家所追求的国家利益实际上并不相同。尤其在文化背景下,国家利益的定义方式更是千差万别。比如,在历史上,农耕文化影响下的民族国家大多对外实行防御战略,即使存在向外扩张的机会,也不愿发动进攻。相反,游牧民族大多具有进攻性,通常以武力扩张实现国家安全。^①

基于对现实主义“国家利益一致性”假定的批评,江忆恩(Alastair Johnston)提出了文化现实主义理论。他指出,中国战略文化对国家战略的制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有两种战略文化,即儒家人文战略文化和极端现实主义战略文化。^②然而,他认为,中国的儒家人文战略文化只是中国极端现实主义战略文化的伪装。在现实决策中,指导中国领导人的战略文化是极端现实主义战略文化。在这种战略文化的影响下,中国的国家战略实际上具有强烈的进攻

^① 金德湘:《中国的和平外交传统与西方的“黄祸论”》,《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11期,第13页。

^② 儒家战略文化和极端现实主义战略文化是相对的,两种文化对世界和未来的认识不同。儒家战略文化强调中国因文化影响不希望发生战争,认为即使在面临安全威胁时决策者也会倾向于选择外交和协商手段。如果战争不可避免,协商无效,除继续寻求外交手段外,中国也会为正义而战,但战争只是最后的手段。极端现实主义战略文化认为,世界充满利益冲突,战争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为了生存,任何国家都会在受到安全威胁时选择使用武力,中国也不例外。

性。中国不仅在历史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是一个扩张型的国家。

文化现实主义理论注意到了中国战略文化对国家战略的重要影响,非常值得肯定。然而,江忆恩的理论在选择案例、中文翻译及历史和文化剖析上都存在着偏见和曲解,导致其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即战略文化版本的“中国威胁论”^①。

正确解读中国战略文化的性质以及战略文化对中国国家战略的影响,是分析和预测中国外交战略走向的关键。为检验江忆恩对中国战略文化的分析,本文将采用政治心理学中的行为代码方法,对中国主要国家领导人在不同战略条件下发布的对外政策及公开讲话进行量化分析。客观地说,量化分析文化变量对国家政策的影响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难题。然而,由于政治心理学中“行为代码”的定义恰恰对应的是战略文化的主要因素,因此领导人的“行为代码”可用于解读战略文化对中国战略走向的影响。通过量化中国领导人决策中“行为代码”,本文旨在检验战略文化对中国领导人战略决策的影响,主要探求三个问题:(1)中国领导人的信念体系是否具有进攻性?(2)中国领导人的文化背景是否倾向于改变现状?(3)中国的战略选择是否具有进攻性?

二、战略文化与决策

战略文化是影响国家战略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战略文化的载体是战略决策人或国家领导人。简单地说,就是文化影响人,而人制定政策。文化如何影响人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本文仅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对此问题加以分析。政治心理学认为,文化影响领导人的信念体系。在成长、教育、社会化和心理认知过程中,领导人的信念体系时时受到本国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而领导人的决策是其信念和观念在特定情况下的自然反映。早期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和苏

^① Alastair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例如,江忆恩认为“Parabellum”与中国的居安思危、有备无患意思一样。但是,“Parabellum”强调为保护和平而发动进攻性战争,而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则强调做好战争准备,未必需要发动战争。由于语言文化背景不同,两者存在本质差异。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武术精神反映的也是一种防御意识。参见 Zhang Tiejun,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Traditional and Present Features,”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1, No. 2, 2002, pp. 73—90.

联领导人的决策反映了两国文化的巨大差异。理解这种文化差异对于理解危机、解决危机和缓解国家间的矛盾乃至建立合作机制都有着重要作用。

作为整体文化的一部分,战略文化直接影响国家领导人“信念体系”的形成并指导战略决策的制定。在分析战略环境和制定政策时,领导人或决策者的“信念体系”指导着其如何选择和分配从外界环境接收来的信息,并赋予这些信息文化和历史色彩。同时,信念体系也帮助决策者做出战略选择。根据认知心理学理论,领导人在接收外界信息时,其信念体系对外界环境信息的处理和政策制定有着三个方面的影响:印证性效应、指导性效应和学习效应。^①

首先,领导人制定的政策会反映和回应外界战略环境,这体现的是信念体系的“印证效应”。其次,在接收到外界信息后,领导人可在信念体系的影响下,针对信息做出判断,采取战略决策,从而引导事件的发展。这是信念体系在发挥“指导效应”。最后,领导人可能会根据以往的经历和历史实践,与现实进行比较,通过类比或学习历史经验,制定出反映信念体系“学习效应”的政策。在这方面,有关绥靖政策的研究就是较为著名的例子。^②

国际关系学中有关领导人的研究存在着很多争论,而领导人对国家政策的制定是否有决定性作用,则是学者们长期争论的焦点。现实主义理论忽视国家间的区别,不大关注国家领导人的作用。在现实主义看来,除了实力大小不同以外,国家之间的其他性质和特征都是相同的。无论谁为国家领导人,其政策只是根据外部环境情况做出理性选择的最终结果。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法西斯造成的,而是世界体系发展不均衡的结果。由于不

① Stephen Walker et al., "Profiling the Operational Codes of Political Leaders," in Jerrold Post, ed., *Th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of Political Leader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Walker and Schafer, "Operational Code Analysis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in Alex Mintz, ed., *Advances 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Yearbook* (New York: Palgrave, forthcoming).

② 参见 Ernest May, *"Lessons" of the Pa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Yuen Foong Khong, *Analogies at War: Korea, Munich, Dien Bien Phu, and the Vietnam Decisions of 196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Elizabeth Kier, *Imagining War: French and British Military Doctrine Between the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Richard E. Neustadt and Ernest May, *Thinking in Time: The Use of History for Decision Maker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6); Stephen Walker, "The Motivational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Belief Syste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7, pp. 179—202; Stephen Walker, "The Evolution of Operational Code Analysi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1, 1990, pp. 403—418。

满一战后的不公平待遇,德国希望改变地位,进而挑战世界体系,最终导致二战爆发。^①然而,国际政治心理学提出的理论强调“以人为本”,即认为领导人对国家政策的制定至关重要。领导人的信念体系是沟通领导人与外部环境的桥梁,因此分析领导人的信念体系是理解和预测国家政策取向的关键。^②该理论认为,信念体系通过“引导领导人如何处理、解释和分析复杂不定的具体环境”来指导领袖们的行为。^③

正如温特(Alexander Wendt)所指出的,世界的无政府状态其实是各国政府(领导人)的主观意志造成的。^④国家的战略决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人如何理解和回应外界信息。领导人的信念体系赋予这些外界信息不同的意义,并通过三种不同效应方式最终反馈到政策的制定上。领导人的决策往往反映出一种对应外部环境的有限理性选择,原因在于信念体系起到了“过滤”作用,使得领导人的决策不一定符合经济学模式中的最优选择,而很可能是根据环境和对手以及领导人个性特点做出的次优甚至非理性选择。^⑤

中国的战略决策走向体现了中国战略文化对领导人的影响,而中国的很多战争决策都显示出很强的儒家文化烙印。^⑥纵观中国历史,虽然以军事实力而言,中国向外扩张的机会很多,但除少数民族占领时期(比如,元朝、清朝),中国实际上很少借助武力侵犯邻国。^⑦在中国现代历史的三次大规模战争(朝鲜战争、中印战争和中越战争)中,中国的战争行为都表现出防御性的文化理念。

① Randal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② M. G. Hermann and C. F. Hermann, "Who Makes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 and How: An Empirical Inqui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3, pp. 361—388, 1989.

③ Yaacov YI Vertzberger, *The World In Their Mind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ognition, and Perception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④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1992, pp. 391—425.

⑤ Herbert Simon,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The Dialogue of Psychology With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9, 1985, pp. 293—304.

⑥ John Fairbank and Jr. Frank Kierman, ed., *Chinese Ways in Warfa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King C Chen, *China's War with Vietnam 1979: Issues, Decisions and Implications*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6); Andrew Scobell and Larry Wortzel, *The Lessons of History: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t 75* (Carlisl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3).

⑦ 西方学者指出,汉武帝统治时期的匈奴政策反映出中国战略文化的进攻性,而中国对越南的进攻历史更是长达一千年。

根据最优理性选择原则,中国出兵朝鲜并不是最佳的战略决策。如果中国的战略文化是进攻性的,则中国无需在中印和中越战争取得战争优势时首先撤军。同理,如果中国的战略文化具有进攻性,那么随着国力的强大,中国当代领导人应该愈加对现状不满并表现出战略进攻性。然而,恰恰相反,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外交实践中,中国领导人一直强调和平处理争端,并与其他国家展开了广泛的安全合作与对话。

因此,本文提出的主要研究假设是,中国的战略文化是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文化。为检验这个假设是否正确,本文采用国际关系政治心理学中的行为代码分析方法,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中国领导人在朝鲜战争和中越冲突中的战略决策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两位领导人决策中的行为代码变化进行比较分析,进而总结和检验中国战略文化的取向。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中国处理战争和危机的关键人物。虽然在决策过程中领导集体可能存在分歧,但最后的决策一般集中反映了关键领袖人物的信念。此外,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具有革命背景的强势领导人。因此,他们的信念体系也应该能反映当时的国家战略决策倾向。^①

三、行为代码研究

国际关系政治心理学的“行为代码”是一个建构在文化元素上的概念。通过比较行为代码和战略文化两个概念的定义,笔者发现两者具有概念通约性。因而决定采用行为代码方法量化和检测战略文化的取向。

战略文化一直是国际关系学术界的传统研究课题,其定义多种多样。目前,学术界广泛接受的战略文化定义是:

战略文化的定义具有两个范畴。首先战略文化包含对总体战略环境的基本评估,即战争在人类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战争是偶然还是必然);对手具有什么特点及其威胁有多大(是零和还是多赢);使用武力的功效

^①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是否有能力掌控局势和消除威胁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武力能收到效果)。以上是战略文化的中心范畴。其次,战略文化的定义包含对具体战争的操作性假设,即什么样的策略选择能最有效地消除环境中的威胁。通过回答战略文化中心范畴的三个问题,我们可以自然得出操作层次上的策略选择。^①

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也将“行为代码”的定义划分为两个部分,即哲学信念(简称P)和操作信念(简称I)。前者主要针对的问题是“世界是怎样的”,而后者主要回答“我们应该如何做”。定义“行为代码”的十个具体问题为^②:

针对哲学信念的问题:

P-1 世界政治的“本质”特征是什么?是和平还是冲突?主要政敌的根本特征是什么?

P-2 实现根本价值和愿望的前景如何?是乐观还是悲观?在哪些方面可以乐观,哪些方面为悲观?

P-3 政治未来是否可以预知?从哪些方面并在什么程度上可以预知?

P-4 对历史发展有多少控制能力?一个人对推动和左右历史向自己预想的方向发展能有多大影响?

P-5 “机遇”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有多大?

针对操作信念的问题:

I-1 如何选择最佳方案采取行动来实现政治目标?

I-2 如何最有效地达到目的?

I-3 如何评估、控制和应对政策行为可能带来的危险?

I-4 什么时候是争取实现利益的最好时机?

I-5 如何使用不同手段争取个人利益,这些手段的效用如何?

乔治认为,这十个信念指数中,P-1、P-4和I-1是最重要的“指导性”信念。

在《文化现实主义》一书中,江忆恩采用了政治心理学中的认知图解和象

^① Alastair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pp. 37—38.

^② Alexander George, “The Operational Cod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3, 1996, pp. 201—216.

征分析方法,来分析中国古代七部兵法和明代将军的战略取向。在解释为什么没有采用行为代码时,江忆恩承认战略文化和行为代码两个概念具有很多相同点,但强调两者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即战略文化是集体性概念,反映整体的文化倾向和选择,而行为代码研究的是个人信念体系和行为。^①

然而,江忆恩忽略了行为代码的发展历史。其实,行为代码首先就是一个集体概念。在20世纪50年代,内森·雷第斯(Nathan Leites)发明并使用行为代码研究苏联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决策特点。^②雷第斯发现,苏联领导人的谈判风格和决策特点反映了苏联文化的特点,与美国领导人截然不同。亚历山大·乔治将行为代码研究系统化,并把其定义概括为十个问题^③。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发展,欧里·霍尔斯特(Ole Holsti)将行为代码模式化,形成霍尔斯特模式。^④后来,根据领导人政治信念体系的动机基础所体现出的政策选择,史蒂芬·沃克(Stephen Walker)将霍尔斯特模式发展为现在的量化模式^⑤,具体可参见图-1。

在霍尔斯特/沃克模式中,有四种类型的领导人(A、B、C和DEF)。A型和C型领导人的信念体系趋向于儒家文化特征,表现为强调和平与战略合作。由于C型领导人认为自己能对历史发展具有更多的控制力,C型领导人因而比A型领导人更具有攻击性。但是,这两类领导人都倾向于优先选择战略调停(settle)而非战略支配(dominate)。DEF类型和B型领导人都属于现实主义者。他们对世界的理解趋向悲观,认为世界冲突不可避免。B型领导人更富进

^① Alastair Johnston, "Thinking About Strategic Cul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4, 1995, pp. 32—64; Alastair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p. 37, footnote 3.

^② Nathan Leites, *The Operational Code of the Politburo*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INC., 1951); Nathan Leites, *A Study of Bolshevism*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3). 雷第斯将行为代码定义为指导布尔什维克政治策略的范畴和行为规范。因此,一个领导人的行为代码可以用来检验领导人的信念和特点是否与战略文化所反映的规范和信念一致。

^③ Alexander George, "The Operational Code," pp. 201—216.

^④ Ole Holsti, "The 'Operational Code' As an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Belief Systems," final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1977, grant no. SCO 75—14368.

^⑤ Stephen Walker, "The Interface Between Beliefs and Behavior: Henry Kissinger's Operational Code and the Vietnam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21, No. 1, 1977, pp. 129—168; Stephen Walker, "The Motivational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Belief Syste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7, No. 2, 1983, pp. 179—202; Stephen Walker, "The Evolution of Operational Code Analysi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1, 1990, pp. 403—4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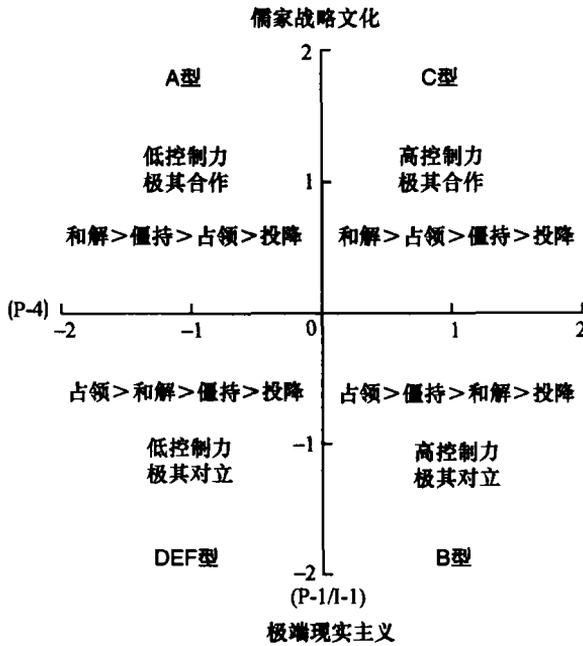


图-1 Holsti/Walker 领导人类型分析和战略文化

攻性,属于进攻现实主义者,DEF型则是防御性现实主义者。领导人究竟属于何种类型,取决于三个“指导性”信念的数值(P-1、P-4和I-1)。不同类型的领导人战略选择的倾向性不同。在霍尔斯特/沃克模式中,每个领导人有两组数字指数,一组是关于自我意象“Self Image”(I-1, P-4a),另一组是关于他者意象“Other Image”(P-1, P-4b),其中 $P-4b = 1 - P-4a$ 。自我和他者意象类型所对应的战略选择倾向,可以表明领导人的自我战略和外部战略。自我战略是指领导人针对外部环境自己做出的相应战略选择,而外部战略则是指领导人认为外部对手可能采取的战略选择模式。

目前,行为代码研究已经发展到使用电脑进行内容分析。运用文本体系动词(VICS—Verbs in the Context System),我们可以通过分析领导人的公开讲话

识别和确认领导人的行为代码。表-1 是 VICS 指标的算法和解释。^① 将领导人的指标与 VICS 指标均数进行比较^②, 可以得出该领导人的行为代码模式。当前行为代码研究的最新发展是使用布莱姆斯 (Steven Brams) 提出的主观博弈理论探讨国家间的战略互动。^③

表-1 哲学和操作信念体系的指标

哲学信念		
基础	指标*	说明
P-1 世界政治的本质(对外信念)	对外及物动词属性(肯定程度减去否定程度(%))	[-1.0,1.0] 敌对 友好
P-2 实现根本价值和愿望的前景(乐观/悲观)	及物动词的强度平均值(涉及对外因素的动词数除以3)	[-1.0,1.0] 悲观 乐观
P-3 政治未来(不可预知/可预知)	1 减去对外信念的定性变化**	[0.0,1.0] 不确定 确定
P-4 对历史发展的控制能力(控制力轨迹)	对自己(4a)或他人(4b)的属性÷(自我和对外属性)	[0.0,1.0] 低 高
P-5 机遇的作用(缺乏控制力)	1 减去 P-3 乘以 P-4	[0.0,1.0] 低 高
操作信念		
基础	指标*	说明
I-1 实现目标的战略(战略倾向)	自我及物动词属性(肯定程度减去否定程度(%))	[-1.0,1.0] 完全对立 完全合作
I-2 策略选择(策略强度)	及物动词的强度平均值(自我属性除以3)	[-1.0,1.0] 完全对立 完全合作

① Stephen Walker, et al., "Profiling the Operational Codes of Political Leaders," "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 Beliefs and Integrative Complexity, Operational Code Beliefs and Object Appraisal," "Saddam Hussein: Beliefs and Integrative Complexity, Operational Code Beliefs and Objective Appraisal," in Jerrold Post, ed., *Th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of Political Leader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chapter 9, 14 and 18.

② 该数据由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马克·社佛 (Mark Schafer) 教授提供。该组世界领导人数据依据 35 个领导人近 300 次公开讲话的行为代码分析得出。

③ Stephen Walker, *Forecasting the Political Behavior of Leaders with the Verbs in Context System of Operational Code Analysis* (Hilliard: Social Science Automation, 2000).

(续表)

操作信念		
基础	指标*	说明
I-3 危险接受程度(策略可否被预测)	1 减去自我属性定性变化的指标	[0.0,1.0] 拒绝 接受
I-4 行动时机(策略的灵活性)	1 减去% X 减去% Y 自我属性的绝对值	[0.0,1.0] 不易改变 容易改变 (策略)
a. 合作与冲突策略	X = 合作; Y = 冲突	
b. 语言与行动策略	X = 语言; Y = 行为	
I-5 具体手段效用(如何使用权力)	以下手段使用调和频率	[0.0,1.0] 低 高
a. 奖励	a 到 f 的权力范畴 a 的频率除以总数	
b. 承诺	b 的频率除以总数	
c. 请求/支持	c 的频率除以总数	
d. 反对/抵抗	d 的频率除以总数	
e. 威胁	e 的频率除以总数	
f. 惩罚	f 的频率除以总数	

* P-1、P-2、I-1 和 I-2 的变化范围在 -1.0 到 1.0 之间。其余指标变化在 0 到 1.0 之间。P-2 和 I-2 除以 3 的目的是使规范定义标准化 (Stephen Walker et al., 1998, 2003)。

** “定性变化”指标指在固定案例数量和变量相同的情况下,所观测到的分布数量和可分布的最大数量比率 (Watson and McGaw, 1980, p. 88)。

笔者不赞同江忆恩将行为代码与战略文化当作本质不同的概念的做法。相反,本文试图用“行为代码”方法量化“战略文化”,通过对中国领导人的行为代码分析来揭示何种战略文化对中国领导人的战略决策产生了影响。中国存在着两种战略文化,即儒家人文战略文化和现实主义战略文化,两者均有与其对应的行为代码模式和战略倾向。具有儒家人文战略文化特征的领导人为 A 或 C 型,而现实主义者是 B 或 DEF 型,其中 B 型是最具有进攻性的极端现实主义者。儒家领导人倾向和平战略,而现实主义者倾向冲突和进攻战略。

本文的数据来源是 Lexis Nexis Internet Index、《北京周刊》、《人民日报》和中国外交部网站。由于本文侧重对外政策分析,选取样本时没有采取随意抽取原则,而是采用了有目的选取的原则,共选取了毛泽东在 1946—1953 年间的 18 篇公开讲话和邓小平在 1977—1981 年间的 24 篇讲话。利用这些样本,论文进行了两个效度测试。第一,检验江忆恩 1996 年提出的论断——“毛泽东是极

端进攻型现实主义者”^①；第二，验证江忆恩 1999 年提出的论断——“受中国战略文化的影响，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领导人也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者”^②。

本文的主要假设为：

H1：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行为代码与世界领导人接近，倾向和平。

H2：他们的行为代码是变化的；危机环境对他们的行为代码变化有影响。

H3：他们的战略选择倾向和平而非进攻；他们的行为代码具有儒家文化特征。

四、毛泽东和邓小平：什么样的领导者？

表-2 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行为代码均值与世界领导人均值的比较。毛泽东的主要信念指标(P-1、P-4 和 I-1)同世界领导人的均值相差较大(大约 1.5 个标准偏差)，而邓小平的指标则略高于世界领导人的均值，显示出儒家文化的和平倾向。毛泽东认为，世界政治充满冲突，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很大，所以他时刻准备使用武力(P-1 和 I-1)。但 P-4 值又显示毛泽东对控制历史发展很有信心。相比之下，邓小平与世界领导人的信念体系很接近。邓小平的主要信念指数(P-1 和 I-1)值显示，他认为世界政治形势缓和，存在着合作的可能。邓小平的 P-4 值也表明他有信心控制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强势领袖。根据表-2，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毛泽东可能是现实主义者，其行为代码比世界领导人行为代码均值要高。但是，他的继承人邓小平却是一个有儒家信念的领导人。他与世界领袖一样期望和平，不希望使用武力。

① Alastair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and Strategy in Maoist China," in Peter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② Alastair Johnston, "Realism(s) and Chinese Security Policy in the Post Cold War Period," in Ethan Kapstein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Unipolar Politics: 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本文仅对邓小平的行为代码加以分析。作者的后续研究更进一步证明了作者的观点。随着中国国力的加强，中国国家领导人却越来越趋向和平合作。因此，进一步揭示了现实主义和文化现实主义理论对中国战略决策理解的偏差和错误。

表-2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行为代码对比及他们与世界领导人的对比

	毛泽东 (N = 18)	世界领导人 (N = 164)	邓小平 (N = 24)
哲学信念			
P-1 世界政治的“本质”特征(合作/冲突)	-0.209***	0.301	0.303
P-2 实现根本价值和愿望的前景(乐观/悲观)	-0.193***	0.147	0.177
P-3 政治未来(不可预知/可预知)	0.214**	0.134	0.158
P-4 对历史发展的控制能力(低/高)	0.232	0.224	0.250***
P-5 机遇的作用(小/大)	0.934**	0.968	0.961
操作信念			
I-1 实现目标的战略(冲突/合作)	-0.283**	0.401	0.417
I-2 策略选择(冲突/合作)	-0.306**	0.178	0.184
I-3 危险接受程度(拒绝/接受)	0.386	0.332	0.329
I-4 行动时机			
a. 冲突/合作	0.521	0.503	0.479
b. 语言/行动	0.602*	0.464	0.531
I-5 具体手段效用			
奖励	0.064**	0.157	0.167
承诺	0.062	0.075	0.021**
请求	0.231***	0.468	0.520
反对	0.191	0.154	0.173
威胁	0.075	0.034	0.016
惩罚	0.375*	0.112	0.100

注:

① N = 案例总数

② * 当 P 值 ≤ 0.10 时,与世界领导人均值不同。

③ ** 当 P 值 ≤ 0.05 时,与世界领导人均值不同。

④ *** 当 P 值 ≤ 0.001 时,与世界领导人均值不同。

⑤ 电脑初步数据(VICS RAW SCORES)可以输出成为 EXCEL 或 SPSS 数据模式,作者采用了后者。单因素(ONE-WAY ANOVA)和复方差(MANOVA)分析都是用 SPSS 软件完成的。

在哲学信念和操作信念上,毛泽东和邓小平也存在着不同。从主要信念值(P-1、I-1 和 P-4)上看,毛泽东对世界的认识比邓小平更为悲观。毛泽东认为,世界充满敌对并倾向于使用武力争取安全。相比之下,邓小平则更倾向于使用警告和奖励而非惩罚性战争来实现战略安全目标。

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行为代码放入 Holsti/Walker 类型模式中(见图-2),

我们看到,毛泽东属于进攻性现实主义者(B型),而邓小平是一个儒家领导者(C型)。毛泽东的行为代码显示其自我战略(strategy for Self)倾向为:占领>僵持>和解>投降;毛泽东的外部战略(strategy for Other)选择倾向为:占领>和解>僵持>投降。因此,毛泽东基本上是一个生活在极端现实主义世界的现实主义者。与之对照的是,邓小平的自我战略倾向为:和解>占领>僵持>投降,其外部战略选择倾向为:和解>僵持>占领>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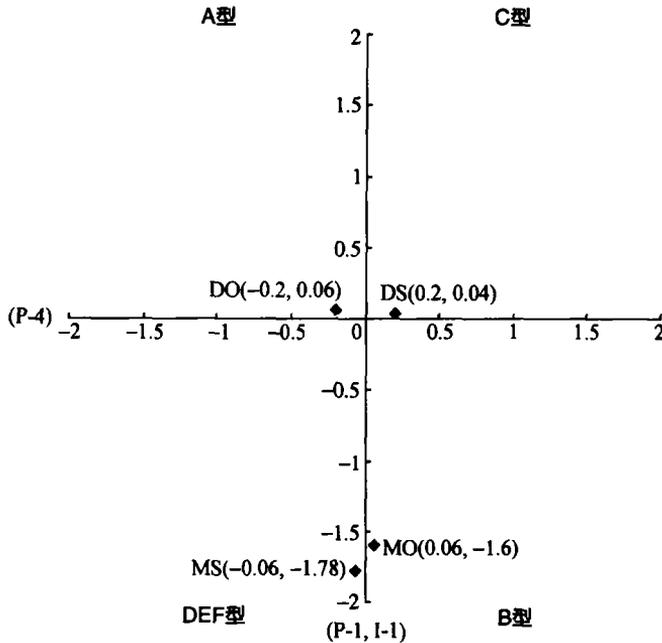


图-2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综合行为代码*

* MS = 毛泽东的自我信念; MO = 毛泽东对外信念; DS = 邓小平的自我信念; DO = 邓小平的对外信念。

以上结论初步证实了江忆恩有关毛泽东的结论。毛泽东的行为代码显示他是一个具有极端现实主义倾向的领导者。虽然毛泽东认为世界充满冲突,但江忆恩有关毛泽东是极端现实主义者的判断仍然过于仓促,而且他对于毛泽东之后中国领导人的结论也是错误的。邓小平的行为代码显示其是一个具有儒家特征的领导者,与其他世界领导人一样热爱和平,希望和平解决冲突。以下笔者将进一步测试这两位中国领导人的信念体系是否稳定,是否受外界条件的

影响而改变,并进一步测试在什么条件下,他们的信念体系发生变化以及发生怎样的变化。

五、战争与和平对毛泽东和邓小平信念体系的影响

表-3 和图-3 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信念体系受战争影响的变化情况。为测试两位领导人的信念体系是否稳定,我们引入了一个控制变量,即战争与和平状态。^① 编码 C = 1 为战争(毛泽东在朝鲜战争中的讲话和邓小平在中越战争中的讲话),NC = 2 为和平。通过两个变量的多元方差分析(MANOVA)测试可以发现,战争对两位领导人的行为代码影响很大(P-1、P-3、P-4 和 P-5)。从表-3 我们可以看出,没有考虑控制变量时,领导人作为自变量具有影响,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哲学信念和操作信念都存在着巨大差异(P-1、P-2、P-3、P-5、I-1、I-2、I-5 请求、I-5 威胁和 I-5 惩罚)。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世界的整体认识影响了他们的具体战略决策。毛泽东对世界的悲观认识决定了其更容易选择冲突手段、惩罚策略和威胁遏制。邓小平则更为乐观,选择的手段也趋向和平。

表-3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信念体系变化:领导人和外部情况
的 MANOVA 不同影响测试

独立因素	主要影响 (案例总数 = 42)		
	F 测试 (1, 38)	P 值 * (two-tailed)	
领导人	P-1	44.661	0.000
	P-2	43.409	0.000
	P-3	4.683	0.037
	P-4	0.267	0.608
	P-5	4.896	0.033
	I-1	18.106	0.000
	I-2	24.653	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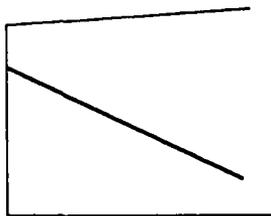
① 这是一个建构有效性的测试。评估此测试的结果可以有三步:第一,确定概念间的理论关系;第二,明确衡量概念的实证关系;第三,根据事实证据是否可以明确衡量概念以判断建构有效性。Edward Carmines and Richard Zeller,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ssessment*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79), pp. 22—23.

(续表)

独立因素	主要影响 (案例总数 = 42)		
	F 测试 (1, 38)	P 值* (two-tailed)	
外部环境	I-3	0.687	0.412
	I-4a	0.001	0.970
	I-4b	0.467	0.498
	I-5 奖励	7.184	0.916
	I-5 承诺	0.932	0.340
	I-5 请求	12.921	0.001
	I-5 反对	0.011	0.290
	I-5 威胁	1.150	0.000
	I-5 惩罚	20.648	0.000
外部环境	P-1	3.628	0.057
	P-2	2.532	0.120
	P-3	6.346	0.016
	P-4	12.312	0.001
	P-5	8.775	0.005
	I-1	0.067	0.797
	I-2	0.250	0.621
	I-3	0.437	0.513
	I-4a	0.143	0.708
	I-4b	0.329	0.570
	I-5 奖励	3.628	0.064
	I-5 承诺	0.636	0.430
	I-5 请求	0.109	0.743
	I-5 反对	0.102	0.752
	I-5 威胁	0.068	0.796
	I-5 惩罚	0.021	0.886
	领导人和外部环境	P-1	3.982
P-2		3.468	0.070
P-3		12.486	0.001
P-4		5.909	0.020
P-5		10.781	0.002
I-4a		2.8899	0.0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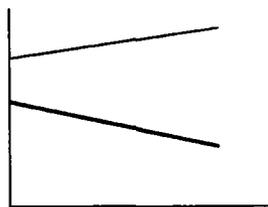
* 当 P 值 ≤ 0.10 时。

P-1 毛泽东: NC=-0.097, C=-0.433;
邓小平: NC=0.302, C=0.3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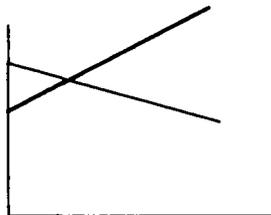
NC=和平; C=战争
毛泽东 _____
邓小平 _____

P-1 毛泽东: NC=-0.097, C=-0.433;
邓小平: NC=0.168, C=0.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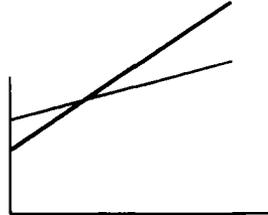
NC=和平; C=战争
毛泽东 _____
邓小平 _____

P-3 毛泽东: NC=0.115, C=0.413;
邓小平: NC=0.183, C=0.133



NC=和平; C=战争
毛泽东 _____
邓小平 _____

P-4 毛泽东: NC=0.157, C=0.382;
邓小平: NC=0.229, C=0.2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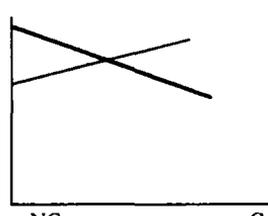
NC=和平; C=战争
毛泽东 _____
邓小平 _____

P-5 毛泽东: NC=0.982, C=0.837;
邓小平: NC=0.958, C=0.965



NC=和平; C=战争
毛泽东 _____
邓小平 _____

I-4a 毛泽东: NC=0.598, C=0.368;
邓小平: NC=0.406, C=0.552



NC=和平; C=战争
毛泽东 _____
邓小平 _____

图3 在战争与和平状态下毛泽东和邓小平信念体系的主要变化

图-4 显示了领导人和控制变量的互动结果。由于领导人的信念体系受到客观历史环境的影响,因此,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行为代码是变化的,而且都变得更具有进攻性。战争情况下,毛泽东的信念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从一个防御现实主义者(DEF型)变为进攻现实主义者(B型),战略选择倾向于优先选择进攻性战略。邓小平的变化不如毛泽东明显,但也从防御性的儒家领导人(A型)变得更富有进攻性(C型)。不过,邓小平始终倾向于优先考虑和平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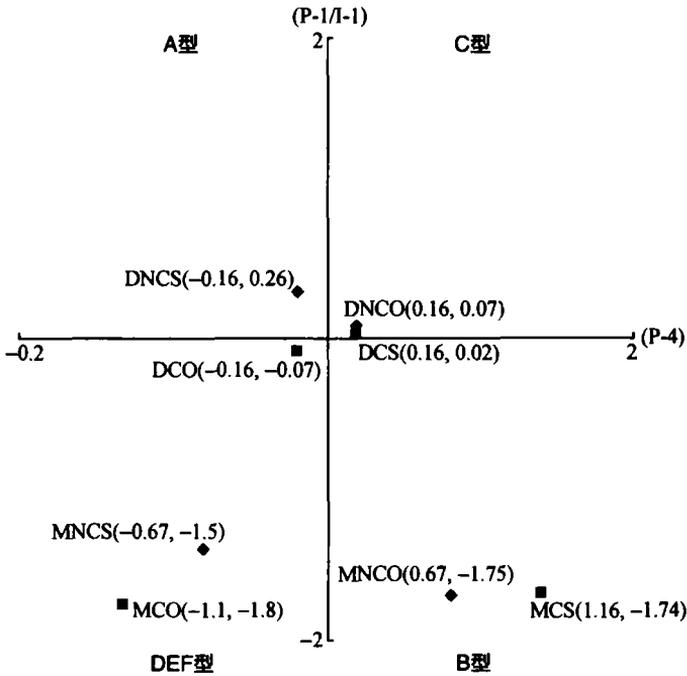


图-4 毛泽东和邓小平在战争与和平状态的信念体系

MNCS = 毛泽东和平状态的自我信念; MNCO = 毛泽东和平状态的对外信念; MCS = 毛泽东战争状态的自我信念; MCO = 毛泽东战争状态的对外信念; DNCS = 邓小平和平状态的自我信念; DNCO = 邓小平和平状态的对外信念; DCS = 邓小平战争状态的自我信念; DCO = 邓小平战争状态的对外信念。

毛泽东的自我战略变化方向和控制水平表明,他由一个防御现实主义者变为一个进攻现实主义者(I-1, P-4),但他对世界政治的认识(P-1)并没有太大变化,认为国际政治始终是充满冲突的。

略。在战争中,毛泽东和邓小平对外部环境的认识仍然是防御性的,但即使在相对和平的情况下,毛泽东也认为在他所处的时代,中国的外部环境更为恶劣。

由此可见,领导人和环境都对战略决策产生了影响,二者具有互动作用。毛泽东在和平时期是防御现实主义者,而在战争期间则是进攻现实主义者。尽管在战争时期,邓小平对外部的认识变为防御现实主义,但邓小平始终是儒家领导人。

以上比较还说明,毛泽东行为代码的变化比较明显(参见图-4),原因在于朝鲜战争中的决策对于毛泽东和新中国都有着生死攸关的影响,而邓小平面临的中越战争则要相差许多。朝鲜战争中,新中国面对的是超级大国美国,毛泽东深切感受到双方军事实力间的差距。虽然毛泽东强调美帝国主义只是纸老虎,原子弹并不可怕,但由于刚刚经历了八年抗战和四年内战,新中国内乱未平、经济不稳,军队尚未休整,台湾也没有收复,因此是否发兵朝鲜毛泽东犹豫不决。然而,当麦克阿瑟的军队打过三八线时,国家的生存危机促使毛泽东下定决心,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显然,战争的危机使毛泽东的行为代码从防御现实主义转化为进攻现实主义。

相比之下,在中越战争中,越南的军事实力和影响都无法与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相提并论。越南虽然号称是亚洲军事强国并与苏联结盟,但其军事实力和国力对中国造成的威胁同美国相比相去甚远。邓小平宣布对越自卫反击是为了给越南一个教训。虽然越南不断挑起边境冲突,但对中国造成的威胁远不及麦克阿瑟跨过三八线接近鸭绿江对中国的威胁。20世纪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中国正处于内部调整阶段。改革开放也刚刚起步,周边环境的稳定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然而,越南入侵柬埔寨并不断挑起中越边界冲突严重破坏了中国外部安全环境,干扰了内部经济建设。因此,从战略角度看,出兵越南可以打击越南在印度支那半岛的霸权主义气焰,缓解外部的安全压力。然而,在取得战争优势时,中国没有扩大战果而是主动撤军,这显示虽然邓小平的行为代码在战争中有所改变,但仍然是优先考虑和平战略的儒家领导人。

六、结 论

通过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行为代码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中国战略文化对领导人战略决策的影响是相当复杂的。相比之下,江忆恩的文化现实主义理论有关中国战略文化具有进攻性的分析和结论则显得过于简单化。虽然本文部分证实了江忆恩关于毛泽东的论断,即毛泽东是现实主义者,但行为代码分析也显示毛泽东并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进攻现实主义者。毛泽东的行为代码随着外部环境对其信念体系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不可否认,毛泽东的个性特征和所处的恶劣国际环境造就了其进攻现实主义的战略文化理念。如果说江忆恩对毛泽东的分析部分正确,那么他有关毛泽东之后中国领导人也都是进攻现实主义者的推论则是错误的。邓小平的行为代码表明,儒家文化主导着邓小平的信念体系并影响其战略决策。虽同为革命出身的领导人,但邓小平比毛泽东更趋向于合作,其对世界的看法也不像毛泽东那样悲观。由于邓小平时代国际环境相对趋于缓和,邓小平及时调整了毛泽东时代“世界战争”的思想,并提出了“世界大战并不是不可避免”及“和平和发展是时代主流”的战略判断。邓小平放弃了毛泽东长期主张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确定了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为核心的基本国策。因此,邓小平的政策更具实用主义色彩和战略防御性。由于邓小平之后的中国领导人将继续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因此中国的国家战略将显示出持续的防御性。

最后,有必要指出两点。首先,虽然江忆恩 2003 年发表的论文似乎放弃他关于毛泽东和其后中国领导人是进攻现实主义者的结论,但其文化现实主义理论对中国崛起分析的负面影响犹在。很多西方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依然以江忆恩的理论为依据,强调文化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并以此批评中国不按照国际规范行使主权、违背自由贸易原则、不尊重军控和不扩散国际条约以及侵犯民族自决和人权。因此,科学地批判江忆恩的文化现实主义理论仍然具有政策意义,将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其次,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强大,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正在就“中国是不是保持现状国家”展开学术讨论。江忆恩提出了一系列衡量“现状国家”的指标,

并据此得出了“中国目前并不是改变现状国家”的结论。然而,他同时也提出要“动态地”评价中国崛起。他认为,中国的国家战略会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因而“不能排除在中国安全困境下变成改变现状国家的可能性”^①。笔者原则上同意江忆恩有关动态地分析中国战略的观点,但同时认为中国的儒家战略文化将影响着今后中国战略文化的基本方向,使得中国的战略行为倾向于防御而非进攻。

行为代码分析方法认为,外界环境对领导人的信念体系的确有影响,但这种影响有时能够反映在决策上,有时则不会。因此,我们不应武断地认为中国的战略方向必然简单地回应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科学地分析决策人的行为代码将为正确论证中国崛起的性质提出实证依据。本文的分析表明,在防御性儒家战略文化的影响下,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领导人不会轻易选择武力冲突。但是,如果被逼无奈,特别是在警告和外交交涉都不能奏效时,中国领导人也会使用军事手段,诉诸武力保卫国家安全。

笔者的后续研究进一步反驳了现实主义和文化现实主义所提出的“中国崛起威胁论”。尽管中国国力在持续增长,但同毛泽东和邓小平相比,当代中国两位领导核心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信念体系更加趋向和平与合作,两者都具备儒家领导人信念体系(即A型)。在加入1996年台海危机、1999年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和2001年EP-3撞机事件危机等控制变量后,江泽民和胡锦涛行为代码中的信念体系显示出很强的稳定性。这表明,即使在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当代中国领导人的战略趋向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仍属于儒家防御性。由此可见,毛泽东、邓小平之后中国领导人的儒家信念体系类型更加稳定。因此,随着中国的崛起,其战略走向仍会表现出相当强的儒家防御性。

^① Alastair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p. 50.

作者简介

冯惠云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师,1994 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获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2002 年和 2005 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分别获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学,代表作有“Crisis Deferred: An Operational Code Analysis of Chinese Leaders Across the Straits,” in Stephen G. Walker and Mark Schafer, eds., *Beliefs and Leadership in World Politics* (Under contract with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电子信箱: huiyun.feng@asu.edu

漆海霞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生。2000 年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获政治学学士学位;2003 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获硕士学位。

电子信箱: qhx03@mails.tsinghua.edu.cn

韦宗友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师。1998 年南京大学历史系国际关系史专业硕士毕业,2004 年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毕业,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理论、美国国家安全与战略。

电子信箱: wzy82@yahoo.com

钟振明 同济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师。2003 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毕业,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美欧联盟关系和国际安全问题。

电子信箱: zhongzhenming@mail.tongji.edu.cn

刘丰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硕士研究生。2004 年南开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本科毕业,获政治学学士学位,研究兴趣为国际关系理论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电子信箱: liufeng00@mail.nankai.edu.cn

张晔杜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1997 年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对外政策与中美关系、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电子信箱: rzhang@nankai.edu.cn